

为政以德

——中国德治传统与现代政治文明

岳金波◎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为政以德

——中国德治传统与现代政治文明

岳金波 著

华文出版社

定了人的社会角色的“先定”，人性的自觉决定了人的社会角色的“修为”。同样是孝，如果是出自自我意识，则为仁德；如果是迫于外在压力，则为人伦之则。由于儒家一贯倡导圣人道德和贵族人格，便有“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人格等差。尽管儒家一向主张“为仁由己”，并把名分的自我界定作为道德的根源和生命的本质，但由于有差分的等级秩序思想的支配，所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便成了宗法政治关系的信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身份名节的自我界定，始终离不开人伦孝道，孝道又是忠道的基础，忠孝观念构成中国家庭政治的核心。可见，“忠”作为中国传统官德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臣”对隐含在政治结构之中的忠道的一种角色体认的产物。

其二，群体分殊意识的体认。人的道德个体性是离不开群体人伦关系的，或者说角色意识总是在人群关系中产生的。反过来，现实的人伦秩序又是通过个体的身份差序来实现的。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子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便是对群体分殊的基本体认。如果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只是社会角色的自我道德意识，那么亲、义、别、序、信“五伦”则是对社会角色的标准设置。这种设置是通过礼制来实现的。儒家对身份的伦理规范，形成了最高的理性结构，这种结构是以皇权意识、家长意识、男子中心意识为基本内容的。

其三，宗法纲常意识的体认。在儒家的伦常观念中，天道的伦理以皇权礼法的统绪作为最高典范，将人性、人伦、人道都纳入天道的纲常伦理范畴，实现天道、王道的统一。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为了把所有人都置于人格血统、身份等级以及荣辱心理所规定的“格式”之中，使道德标准、身份界定都符合礼制的要求，差序分殊的社会关系在天人和合的宗法秩序中定位。君臣、臣民关系体现了天道的伦理，是伦理政治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身份关系。

人类社会从初始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身份关系，因为象征道德和种群差异的身份角色对人类活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儒家注意到这种客体性，并把合乎自然秩序的个体差异与群体分殊视为宗法制度的合理化。儒家身份认同的最高理念来自“天命”或“王道”的理解，类似的人文环境使每一个身份角色都好像是预先安置好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实际存在，也都必须定位于相应的制度。所以土地制、户籍制、世袭制始终是确定身份、等级、占有、分配的根本制度。这样，身份角色对一部分人来说，象征着特权和人格；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人伦和责任的标志。由贵族人格扩张和平民道德萎缩导致阶级差序向两极延伸的结果，终于演绎出压制与反压制的社会对抗的残酷规律。

儒家的身份伦理不但在政治意识中得以体现，而且有制度上的规定。身份的框定首先就涉及户籍、丁赋、铨选、爵赏、名讳等各种制度。这些制度依照不同的身份角色

体上属于穷国,是发展中国家,更要命的是,它有一支大概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队伍,这就决定了它根本不具备“高薪养廉”的基本条件。另外,从实际操作上看。“高薪”在量上总是一个十分难以把握的概念,在我国目前这种生产力条件下,党政干部的工资究竟要高多少才能使之不想贪呢?这大概也够得上分配领域中哥德巴赫猜想了。

第五,高薪养廉如果勉为其难地实施,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是会更加强化本来就十分严重的“官本位”观念,使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因为社会人员总是向利益趋高点移动;二是会加大财政赤字,甚至会引发通货膨胀;三是会加剧党政官员同工人阶级及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使社会各阶层严重失衡,造成社会动乱。

总之,我们不能照搬高薪养廉的经验,必须尊重中国国情,实行以俸养廉,道德、法律、薪制三管齐下,这样才能使廉政建设富有成效。

3. 尝试廉政金制度

随着公务员队伍的不断扩大,公务员廉政勤政工作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切实加强廉政和反腐败工作,已经成为中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中国廉政建设的方式主要是进行法律纪律教育、强化职业道德等。近几年,中国还出台了政府采购、行政许可、公务员统一发放津贴等措施,希望从制度上减少腐败现象。而廉政金制度则首次把公务员的经济利益和廉政建设结合起来。我国1993年开始实行公务员制度,现有公务员500多万人,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公务员录用、培训、考核和晋升体系。

近年来,为抑制腐败,北京、湖南、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的政府正在尝试推行廉政金制度,希望以此约束公务员队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检察院一位名叫贺龙江的副科长,因将手机借给犯罪嫌疑人使用,近日不但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而且被扣除了1000多元的廉政金。浏阳市是中国大陆最早实施廉政金制度的地方,目前已有700多名公务员受此制度约束。浏阳市人事局局长陈涛介绍,廉政金在银行设立专户储存,由个人和集体两部分组成,个人部分按本人当月基本工资的5%提取交纳,集体部分则从单位行政经费结余中列支,数额相当于个人交纳的2倍。公务员退休时,可以一次性领取廉政金。若发生违纪腐败行为,按程度从扣除全额廉政金2%的比例开始直至扣完,而且违纪者不能享受当年集体部分的廉政金。

例如,北京市门头沟区地方税务局实施的勤政廉政保证金直接和员工的工作业绩挂钩,一年发放一次。据介绍,一个正科级公务员若年度考评合格,则当年可以领到2400元的保证金,若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则扣除全年的保证金。中共浏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党风廉政室主任李贛文说:“廉政金制度增加了公职人员违纪腐败的成本,从正

可有效地抑制官僚主义,从而提高官德水平。

三、为政者的羞耻观

“君忧臣辱,君辱臣死”是中国古代的为政者的羞耻观。所以,当金兵渡过黄河而自己无计可施的时候,当时的宰相李纲就“羞撞金銮殿”,所以,当金兵在后,而自己无路可走的时候,南宋大臣陆秀夫抱着南宋的小皇帝跳入了大海。这是“大臣向皇帝一人负责制”的必然道德要求。也有少数的封建社会的官员“向人民负责”,如郑板桥,他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虽然他的“为民做主”的思想与现在的“民主”思想相悖,但其向人民负责的“引咎辞职”的态度,是我们今天的许多共产党的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腐败分子和尸位素餐的无能官员所远远不及的。

官员应以无政绩为耻。尤其是我们共产党政府的官员,更应该如此,觉悟应该更高些。道德惩罚是从消极的方面通过社会舆论或传统习惯的方式对当官者的失职行为给予道义谴责,从而启发其良知,加强其责任心,达到勤政廉政的目的。但是,有的官员根本就不以无政绩为耻,心安理得,厚颜无耻,稳坐钓鱼台,怎么会跳楼自杀呢?知耻是一个人获得道德生命的前提。“有耻且格”是一个人德成熟的标志,是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期望,是个体道德品质中的核心因素。

知耻是个人的道德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过失进行自责的一种认知,具体表现为羞耻感。羞耻感的真正体现是内疚。内疚是主体意识的产物,它激活潜在的思维和力量,专注于过失的懊悔和追悔,促进个体的心理成熟。如果个体的内疚,那他将道德不屑一顾,或许会知羞,但不会知耻,达不到“有耻且格”的认识。同时,羞耻感以自尊为前提,一个没有自尊的人是不会知耻的,更不会自责。自尊体现了对自我社会化的切近,没有自尊的防卫,就不能有自责的意识和自责行为的发生。在此意义上说,有无羞耻感标志着人格的高下,标志着人是否有道德自由,因为知耻是在自己本身内的自我的自由。知耻一方面表现为对他人不道德行为的愤慨和厌恶,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的惭愧和悔悟。知耻是自我改造的开始,是道德意识被唤醒的表征。马克思说过,羞耻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这表明知耻已经具有深刻的道德评价意义,而且是抵制不道德行为的强有力的抗毒剂。

无耻是知耻的背向,是漠视道德和自我的极端表现,就是“不要脸”。“老子有权我怕谁”就是这种无耻的表现。“老子有权我怕谁”是权力对道德的藐视,鲜明地向世人昭示了当权者的丑恶的人生哲学。权力与道德从来就是纠缠在一起的,道德要制约权力,而权力又试图超越道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君子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的传

统,权力者首先应是道德者。而在有的当权者看来,道德只是平民百姓的事,权力拥有者不存在道德问题。权力作为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人性的墮落和文明的毁灭。权力产生何种效应,关键在于权力由谁来掌握。有德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服务于人民,造福于社会;无德者利用手中权力会攫取私利,弄权误国。因此,掌权者的德性如何,是权力是否会腐败的重要因素。

无耻作为一种恶劣的品质,对于权力拥有者来说,之所以会导致腐败行为的产生,其原因主要表现在无耻的三个层次上。

无耻者首先无视做人的责任。在无耻者看来,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对他人发号施令、满足一己之私欲的力量,就是去要求他人“应当如何”而从不反省自己“应当如何”。无耻者会完全抛弃权力本身所凝结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依仗自己占有或控制的权力对自己应负的义务和责任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任何道德约束都是无效的,他们甚至无情地嘲弄、做贱道德,践踏社会公共利益,拿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当儿戏。无耻者在无视社会责任的同时,连同自己做人的资格也抛弃了,因为人之为人是以其责任为表征的。一个有权力就目空一切的人,不会有责任感,只会成为“贪官”或“独裁者”。

四、问责与引咎辞职

1. 失职行为及惩罚

为官一任,毫无政绩,就是失职。失职行为如果造成重大损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既没有造成显性损失,也没有政绩,则要受到道德的谴责,当官者应受到良心的谴责。遗憾的是,还没有听说过,某个官员没有把单位搞好,把企业搞垮了而内疚不已,自寻短见的。当然,我不是鼓励那些“昏庸”们都去跳楼,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当代中国一些官员的责任感何其淡漠,良心几何?

失职行为,从狭义上去理解,是属于渎职犯罪的范畴,如玩忽职守罪。从词源上考察,“渎”作“烦渎”、“轻侵”、“不敬”解,“渎职”就是“不尽职”。我国刑法对渎职行为定罪的含义也是源于此。渎职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不尽职责,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故又称职务上的犯罪或者服务上的犯罪。渎职犯罪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掌管一定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不依法行使法律和人民赋予的职权,而是借权谋私,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侵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贪污、受贿、刑讯逼供、报复陷害均属此类;二是国家工

作人员对自己应当履行的职责敷衍塞责、消极怠工、玩忽职守,最终酿成灾祸,使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里我们讲的失职主要是指第二方面,指失责行为。

失职,就是失责,是享有一定权力的人对自身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的一种无视和糟蹋。有权者,必有其位,须谋其政,负其责,尽其职。在其位,享其禄,不谋其政,则是掌权者最大的堕落。责任感反映的是个人对待社会和他人的态度问题。要做人,首先就得承担责任,何况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人。权力的真谛、法律的尊严、道德的力量首先是由责任来决定的。放弃责任就等于放弃权力,也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

然而,玩忽职守、不负责任往往成为现实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度下,权力是分等级的,所谓“人分五等,官分七品”,一级管一级。掌权者的唯一使命就是上传下达,听上级的话,按上级的精神办,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最好的官。下级出了问题,有了毛病,犯了错误,也就可以往上推卸责任,因为都是按上级精神办的。这样,中国的权力阶层很少有主动的责任心,即使有“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也会终因权力的宝座高于一切而使社会责任感抛之脑后。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史的命运似乎全押在皇帝一个人身上。

今天,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还不够健全,玩忽职守现象在干部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徒有虚名,实有其利,唯独不尽其责;有的消极怠工,不积极主动承担责任,互相推诿;有的职责不明,有其职,无其责;有的干脆没有责任,空挂一个官名,坐享其成。因玩忽职守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全国大得惊人。国家财产的严重浪费当然令人痛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干部无视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敷衍塞责、失职渎职的官僚主义作风。更令人愤慨的是,对于严重的事故,失职者却若无其事,厚颜无耻地为自己开脱罪责。

我国的《唐律》中就有了对失职行为的处罚规定。唐律中专辟一篇《职制篇》来规定官员失职方面的犯罪。1910年由宣统皇帝颁布的《大清新刑律》第一次使用了“渎职罪”一词,并单设“渎职罪”一章,特别提出了不尽职责罪。我国刑法中专门有对玩忽职守罪的有关处罚规定。可见,对造成重大社会损失的失职行为给予法律上的惩罚,已成为一种历史传统,并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正不断得到强化。问题在于,那些没有带来明显损失的不尽职行为、官场上的那些懒汉,如何处置,道德惩罚,便是方法之一。

2. 责任感是官德魂

官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也是权利与义务的交互体,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角色权利的超众性和角色义务的繁重性。一个官员有无责任感,是否忠实地履行义务是决定其有无政绩或政绩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衡量其道德水平高低的内在尺度。

如果说人类的社会关系是一张硕大无比的网,那么责任就是这网上的扭结。如果哪一个网结上出现了松动或破损,网就会出现漏洞,社会的良性运行就要受到损害,社会的主旋律就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责任是行为主体在社会关系中对特定任务的自由确认和自觉承担。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每个人所履行的社会义务也不一样,责任就不可能是平均分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责任是依据行为主体“扮演”的角色变化而变化的。责任永远和角色联系在一起。个人扮演的角色多,相应承担的责任也越多;个人扮演的角色重要,相应承担的责任也重大。社会之所以对官员期预最高的道德期望,就在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重要,其责任重大。

责任一经行为主体认同,就会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就成为自己的内心信念和自觉行动。特别是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重大责任被人们认同以后,就会产生远大理想,就会产生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就会产生巨大的内在趋动力,促使主体积极顽强地履行责任。责任感是一种内心信念,是主体履行责任的一种内在鼓动力。责任感是良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履行责任并完成任务好时,会有一种良心上的满足感;当没有履行好责任时,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客观的使命之所以能够转化为个人的责任感,主要取决于责任的基本向量。责任在社会生活中有这么几个向量:从集体责任到个体责任;从外部责任到内部责任;从向后看的责任到向前看的责任。集体责任实际就是社会的集体使命,如我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而个体责任则是对社会责任的分担,或者说是集体责任的分配。没有集体责任向个体责任的转化就没有所谓的责任感。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集体责任的科学、公平、合理分配问题。

有些官员之所以没有责任感,要么是责任不明确,要么是因为责任不到位,要么是因为权力大,责任小。集体责任的分配应当是与权力分配相当,否则,就会造成权大责小的“闲官”、“昏官”的产生。外部责任是以社会、集体为社会监督和定性的责任,内部责任则是以个人本身为社会监督和定性的责任。二者之区别在于,前者是以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为基础而客观存在的外在规定性,后者则以个人的主体认同和需要为基础而主观存在内在自觉性。官员只有把外部责任转化为主体自觉,才能算真正有了责任感。向后看的责任就是对过去的事情所承担的责任,向前看的责任就是对将来的事情主动承担的责任。前者是表明在事情发生之后如何分担责任的问题,后者表明对责任的主动履行。真正有责任感的官,不是在等有了问题之后去承担责任(这当然比推卸责任者强),而是积极主动地去为国为民分担责任,千方百计地去造福于人民,实现由被动承受到主动履行的转化。

责任感之所以是官德之魂,首先在于责任感的有无与强弱的水平。如果说政绩构成官德的硬件,那么在政绩的背后靠的是责任感。为官者如果想的只是如何利用手中

权力来牟取私利,或者只是为了“混一混”,根本就没有心系人民、心忧天下的情怀,那就不可能有政绩,也不会干好任何一件事。因为“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页)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本身就不具备当官的首要条件,还会有官德吗?毛泽东早就批评过这种人。毛泽东指出:“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其次,责任感直接体现了官员的职业良心。良心是对履行社会义务的强烈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职业良心是行为主体对职业责任的自觉意识。职业良心依据履行责任的道德要求,对为官的动机进行自我检查,对为官活动和过程进行监督,对为官后果进行评价。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内心得到满足和欣慰;为官一任,一事无成,甚至是“败家子”,就会表现出内疚、惭愧和悔恨,从而毅然发奋,造福于民。面对人民的重托、老百姓的期待,那些玩忽职守者、无所事事者、国家财富的吞没者是否会扪心自问:“我良心何在”?

3. 中国走向问责制

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以罕见的大篇幅阐述政府改革,其中对“监督”和“责任”的突出强调,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温家宝在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谈到依法行政,他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这表明,中国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评论说。

再联系到2月中旬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个中国共产党执政54年来第一个全面、系统推行自我约束与促进自我发展的党内制度规范,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分析人士认为,“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

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

“问责”的含意很简单,就是责任追究制。“问责”并非完全是“舶来品”,中国古代即有挪用救灾物资要被处以极刑的严厉规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问责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大兴区区委书记沈宝昌说,要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手中的权力和需要承担的责任同样重大,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失职和腐败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建立问责制度也成为2004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的强烈呼声。“政府在依法行政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应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政府,一个能够接受人民问责的政府,”全国政协委员吴正德说。他呼吁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引咎辞职制度,让政府和公务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防止权力滥用。“问责不仅意味着出了事官员要引咎辞职,而且可以对那些平平庸庸、百姓不满意的官员,责令其辞职,直至免职,”杜钢建说,不从问责入手,就难以真正整肃吏治,也就难以落实执政为民、权为民用的理念,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下一步中国完善问责制的方向,仍然是‘制度化’,”杜钢建说。据透露,将要实施的“国务院依法行政纲要”,也强调依法行政最后要落实到责任追究上。纲要中提到要制定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行政强制行为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此外,与问责制度紧密相关的国家监督法、公务员法也将出台。

人们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5日面对数千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郑重表态: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同时,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政治问责重在‘异体问责’,而上述各方对政府的问责,就属于‘异体问责’,这充分表明了本届政府推进问责制的决心。”杜钢建认为。

温家宝总理表示,本届政府将从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依法行政和民主监督三方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短短一年之后,人们现在看到,一个“透明和可问责的政府”已经开始显现雏形。

第三节 勤政为民报国

一、古今勤政范例

“臣道务勤，勤则职业修而事无壅塞。”勤政与敬业、劝业相连相通，只不过勤政专对领导者而言。百德勤为首，勤劳是人类公认的美德，不因种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异义。对领导者来说，勤政有两个作用：一是树立公众形象，带出一种好作风。二是保个人终生平安，避祸远难。勤政是对下属的最好示范，是无声的命令。榜样的力量已为人们普遍认同。领导者在工作中总是树立各种先进典型让下属跟上，看齐。但典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领导者自身这个典型。领导者自己以身作则，其影响和效果比任何其他典型都要好。下属跟着这样的领导就有安全感、信赖感，整支队伍就有凝聚力、战斗力。他们会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成功。

美国学者对东方传统文化下的企业管理进行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在日本，最高主管的作风声望对其他人的影响，其重要性不亚于一个单位的策略、结构和制度。一份调查统计显示，认为领导声望是“非常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素质的人，在美国只有16.8%，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日本却占90%。其实，表率产生的个人声望是中外各国成功的领导者的共同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登陆作战一个月前，就跑遍了他的百万大军的营地。官兵们都已经亲眼见过自己的统帅。这个瘦小的指挥官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的贝雷帽，官兵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有人评价他那顶帽子至少值一个军。统帅的形象对士兵的精神鼓舞竟是如此的神奇。历史已作定论，诺曼底登陆是决定同盟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败的关键。

中国历代对勤政敬业更是褒扬有加。远古的周文王的祖父留给周文王的训条是：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敬重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克服怠惰懒散的习惯就会得吉；让怠惰的心理占上风就要遭灭亡。孔子的先祖正考父是这样对待职务晋升的：《史记》记载他“一命而偻，二命而佝，三命而俯”。偻、佝、俯是表示背脊弯曲程度的字。俯已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官当得越大，他的腰弯得越厉害，危机感越重。三命是上卿之职。

就凭孔子先人的这种敬业精神,鲁国大夫孟懿子认为“圣人之后,必有达者”,临死时把儿子叫到身边,对儿子说:“我死后你要把孔子当老师,跟他学习。”汉武帝一次问社会贤达、八十多岁的申公如何治理国家。申公说:“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就看你身体力行得怎样。“德”这个字比较抽象,难以把握。古人提出“力行近乎德”。任何事情你只要力行就接近于有“德”了。南宋将领郾琼兵败投降了金国,继续带兵打仗,对两国将帅的作风深有体会:金军打仗,元帅、王爷都临阵督战,矢石交加战斗白热化时脱去盔甲指挥,各级将校意气自如,下面士兵没人敢怕死;南宋将帅出兵,身居数百里外,军令派侍从传递,而且这个军令也是参谋助手的主意,不是将帅自己深思熟虑的决定。郾琼认为金国军队所向无敌,而南宋军队像惊弓之鸟,听到金军拨拨弓弦发出点声响就败散而逃也是必然的。

1943年4月,中国共产党进行延安整风。北方局的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批主要将领去延安。北方局及其下属的八路军总部、129师、晋冀鲁豫边区的全副担子落在邓小平肩上。这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相持阶段。邓小平独力挑着这副担子,完成了任务。几十年后,女儿毛毛问他:“当时你一个人在前方,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只轻笑了一下:“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真是举重若轻,弹指定乾坤。

《诗经·小雅》教导后人:“密尔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把你的事情做得密实些,不要说什么功劳苦劳。即使你无罪无错,还会有人到处说你不好。所以古贤勤小事,免大患。勤政敬业的楷模是诸葛亮,人们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他。这是诸葛亮《后出师表》里的句子,也是他出师前向扶不起的阿斗皇帝表明心迹的话。他也是如此实践的,五十三岁就过劳死了。他如果活到七十三岁,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也许就要重写了。他留下的“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食未熟,将不言饥”,是他带兵的沥血之言。诸葛亮的勤政令人叹为观止。他一生用兵只出过一次差错:一出祁山伐魏时,他把指挥权交给了马谡。《三国志》记载:“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下不据城。张郃绝其粮道,大破之。”街亭丢失,诸葛亮挥泪斩了应当承担责任的马谡。毛泽东读书至此批注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诸葛亮在首次伐魏这样一个重大军事行动中,应亲临前线,不应把前线指挥权交给马谡。《三国志》又写道:“六月,亮以粮尽退兵。司马懿遣张郃追之。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叫张郃右膝而卒。”一个“乱”字可以体会到诸葛亮的满腔复仇情绪。伟人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此又批注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一次差错后再不出第二次错,这是诸葛亮的绝顶聪明之处。毛泽东读书发现了这个秘密。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史载:诸葛亮死后东吴起兵侵犯,蜀国已是无人可用。诸葛亮当年南征北战,为防东吴偷袭,用石头在长江岸边摆了个八阵图。吴兵远远望去,杀气冲天,似有十万大军埋伏,不敢前进。相持日久,派人打探,原来是一堆石头。听来似

神话故事,但八阵图起码在唐代还有遗址,杜甫有首怀古诗《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重视初战,初战必亲自指挥,是毛泽东实施领导工作的重要原则。他对自己的重大决策总是亲自过问。开国大典阅兵式总指挥杨成武在回忆那次历史性的活动时,说毛泽东亲自检查筹备工作,并一再向杨成武交待“慎重初战”、“初战务求必胜”。

陈蕃是东汉声望卓著的学者、官员。陈蕃年轻时,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懒散成性。他父亲的朋友薛勤到访,看他住房里外又脏又乱,就说:“你家里来了长辈、贵客,也不稍加收拾吗?”陈蕃说:“大丈夫处世,当横扫天下,哪用得着在小小几间屋子上下功夫!”薛勤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从此尽扫狂傲之气,不捐细谨,终于有成。海湾战争使指挥官、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黑人鲍威尔(后为美国国务卿)名扬全球,而他的成长成功得益于一个少年时代听大人讲的故事:三个管道公司的挖沟人,一个工作时老是拄着铲子说自己将来要做老板,一个老是抱怨工作时间长报酬低,第三个总是埋头挖沟。过了20多年,第一个仍在管道公司拄着铲子,第二个虚报工伤借口退了休,第三个成了那家管道公司的老板。当鲍威尔参加工作在汽水厂抹地板时,他打定主意要做最好的抹地板工人。一次,有个人打碎五十瓶汽水,满地都是黏糊的棕色泡沫,他十分生气,但还是耐着性子抹干净。过了不久,他的认真负责被工头赞扬:“地板抹得真干净。”第二年他被调到装瓶部,第三年升为副工头,后来应征入伍。他牢记这个道理,认真尽力做好每一份工作,不断进取,终成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二、勤政造福苍生

一个人在世,为世所用,最要紧的是今天做了什么,而不是将来想做什么。佛家劝人“但行善事,莫问前程”,是说只要积善为德,前程自在其中。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佛家的训条不妨改动两字作为座右铭:但干实事,莫问前程。今日之果昨日之因,今日之因明日之果。快餐集团“麦当劳”有个锯椅背的故事。有一段时间麦当劳面临严重的亏损危机,总裁克罗克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层经理们习惯于靠在椅背上指手画脚地抽烟聊天。于是他向各地发出一个指示:把经理的椅子靠背全部锯掉,让经理们实行“走动管理”,这成了麦当劳取得巨大成功的金钥匙。古人论勤政敬业时说:“从政莫尚乎敬”,“敬者,德之聚。”是说执政要把勤、敬放在第一位,勤敬是一切美德的集中体现。战国时的晏子,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愿意为他执马鞭当仆从的政治家、外交家。史书记载晏子在朝廷上,国君如表扬他,他就担心自己可能名不副实;如国君没

有表扬他,他就担心自己行为不检。又说晏子是“国有道即顺命,国无道即衡命”(衡量国君的命令是否可行,可行则行)。荀子认为,做一个好将领要做到“五无旷”:敬谋无旷,敬事无旷,敬吏无旷,敬众无旷,敬敌无旷。旷,废也,即随意处之。《周易》的需卦卦辞:敬慎不败也。对我们通常说的“大吉”,荀子是这样解释的:“虑必先于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为大吉。”

勤政就是忠于职守,勤奋敬业,尽职尽责,不当“懒”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方法,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是党的宗旨所决定、作风之体现,也是领导工作性质的必然要求。

首先,强调勤政是由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决定的。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服务者,必须在其位谋其政,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权力的使用当作为人民服务的过程,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这就决定了勤政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根本责任,是广大党员干部的第一要务。每一个领导干部只有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增强大局观念和使命感,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才能更好地为人民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干部在自己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切实把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好,就是最好的勤政,也就从根本上实现了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其次,强调勤政是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的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比过去更大,要求更严,标准更高,更加需要坚持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进一步转变观念,改进作风,使勤政富有成效。作为领导干部,如果思想主观臆断或凝固僵化,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在与群众的关系中出现偏差,勤政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不断适应发展了的新情况,才有可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勤政为民;只有进一步转变作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充满生机与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勤政利民。可见,在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中,把勤政作为密切党和政府同群众联系的重要途径,不仅是党的思想路线的要求,也是党的工作作风的体现。

其三,强调勤政也是领导工作性质的必然要求。什么是领导?邓小平指出:“领导就是服务”。江泽民同志也曾明确强调:“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这就告诉我们,勤政是实实在在的事,需要老老实实地干,知实情、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以优质的服务,一流的成绩取信于民。如果只图形式,搞花架子,把勤政当成口号,有哗众取宠

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只能给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最终招致人民反对,做好领导工作就成了一句空话。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行政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工作部署多,检查少;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浮在上面多,深入基层少。为此,各级领导干部一要廉洁、勤政,二要务实、高效,通过切实有效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一个优秀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也是领导工作性质的必然要求。

其四,强调勤政还要从群众最紧要最迫切的事情做起。勤政,只有从最大多数人最紧要最迫切的事情做起,才能使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才能使党群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到加强。因此,在当前情况下,要了解民之所思,做好民之所盼,适应民之所需,就要认真实践江泽民同志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四句话要求,廉洁从政,严格执政,努力做到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

1. 要深怀爱民之心,注重体察民情。

领导干部要对人民群众充满敬爱之情,牢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成果属于人民的原则,把群众的安危时刻挂在心上,深入基层,走村入户,真正知悉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忧什么。这样,才能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才能在与群众接触中倾注“实情”、融入“真情”、充满“感情”、主动“热情”,从而实实在在地体察民情,并将爱民之心付诸行动,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要经常置身于群众之中,通过广泛而频繁地与群众接触、交往,做到情况在一线了解,情感在一线融通,情意在一一线体现。如此伏下身子、放下架子,与群众接触多了,身上的官气就会减少;与实际接触多了,主观主义就会减少;与民情接触多了,虚假浮夸就会减少。

2. 要恪守为民之责,注重了解民意。

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意愿。而要真正体现人民的意愿,就必须恪守为民之责,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抓紧解决那些不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符合人民的意愿和要求的突出问题;就要十分注重了解民意,倾听民声,根据民需,多为群众尽一些“雪中送炭”的责任,做到今天能尽的职责不拖到明天,这次能尽的义务不拖到下一次,使群众的后顾之忧及时得到化解,使他们的正当利益和要求及时得以满足。要把关心群众,切实为群众谋利益作为尽职责、顺民意、解民愁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正当合理、急需解决而又能解决的问题,要不失时机,竭尽全力,尽快解决;对

于应该解决而暂无条件解决的问题,要尽职尽责,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对于不合理的要求,要尽到责任,仁至义尽,通过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使群众提高认识,正确对待。只有这样恪尽职守,才能适应民意,真正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诚意和行动,才能认识到党和政府是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是和他们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反之,就会违背民意,失去民心,甚至丧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3. 要善谋富民之策,注重集中民智。

善谋富民之策,就要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树立群众观点。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与实践第一线,对于许多问题他们最了解情况,最具有发言权。注重集中民智,就要善于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用以指导工作。实践证明,凡是成功的政策,都来自群众的创造,来自群众经验的提升。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做到:在指导思想,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不断向前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求得真知,谋取良策;在发展思路上,要以大多数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为决策依据,让群众及时得到应该得到的实惠;在工作部署上,要以大多数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为第一信号,把大多数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生活中的难点作为决策的重点;在工作方法上,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把群众分散的、点滴的闪光思想集中起来,化为工作中的具体方针政策。同时,又要善于引导和启发群众的自觉性,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使具体的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更加有效,使各项工作部署和落实措施符合实际、富有成效,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 要多办利民之事,注重珍惜民力。

多办利民之事,就要从民生、民利、民力的实际出发,把党的宗旨和“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大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小到每家每户的柴米油盐、水电气暖、生病就医、读书就业、衣食住行等方面上,使之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一座座桥梁,成为人民群众感受党和政府温暖的一个个载体。多办利民之事,还要从群众最关注、最盼望、最不满意、最急需办的事抓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事情有大小之分,有轻重缓急之别,老百姓的一些难事、急事在领导干部那里或许是小事,但对老百姓来说可能就是大事。作为领导干部,就要耳聪目明,勤奋行政,做到凡个人职责范围内该办的事,要放

开手脚,速办“快通”;工作运转不畅、办事环节受阻时,要积极主动,及时沟通;在利民之事落实面临困难与矛盾时,要迎难而上,积极疏通;对影响群众生活的条条框框,要解放思想,大胆变通。这样,为民办事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凝聚民心,珍惜民力,就要多办利民之事。只有这样,才能把科学的决策和部署真正落到实处,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就拥有了深厚、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三、勤政才能报国

1. 做官必须做事

做官为什么?中国有首妇孺皆知的小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意思是:因为天子老儿重视读书人,所以我才教你们读书。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呢?有诗为证,“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紫蟒带,书中自有千钟粟”,意思是,读好了书可以有一个“娇娇”的妻子,可以发大财,可以做高官,可以有厚俸禄。可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飞赴凤凰台”,“早年无钱可娶妻,现在却成了皇帝的东床快婿”。简单地说,读好了书可以做大官,只要做了大官,其他的就什么也不愁,什么“颜如玉”、“黄金屋”、“紫蟒带”、“千钟粟”统统不在话下。

做官为什么?中国古人多数是为自己,在封建社会,“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官、以“国疾民瘼”为己忧的官少之又少。

有人打了个比喻,说“西方人的自由与民主栓在钱袋上,东方人的自由与民主栓在印把上”。意即西方是一个“钱本位”(资本本位)的社会,东方是一个“权本位”的社会。中国人有句话叫“升官发财”,升官之后就可以发财。这个传统自孔子而来,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追求。所以,“升官发财”成为中国人、中国读书人的信条,几千年一直如此,在本质上没有多大改观。

如前述,官员的选拔与评价标准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德才兼备,而在于德与才何者重要。之所以会陷入德才孰主孰辅的困惑,原因在于把德才分离,乃至把二者看成对立物。在泛道德主义的理念中,德唯重、唯主、唯大,这自然会导致官德评价系统中的唯德或重德轻才倾向,在重德中又导致唯动机论倾向。“没有功劳有苦劳,苦劳也是资本”、“无过便是功”曾一度成为官员评价的价值尺度。官员们争相做的不是如何为国为民办实事,而是比思想境界高低、比态度好坏、比谁听话,导致了一批不干实事、不图业绩、专注于假、大、空的“滑官”、“昏官”产生,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使党痛心,国家

伤心,人民灰心。市场经济的效益观,不但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为生产而生产的经济生活格局,而且给政治生活也带来了勃勃生机。人们对那种不干实事的官深恶痛绝,没有功劳的苦劳一文不值。“无功便是过”成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一大批思想过硬、脚踏实地、讲政绩、讲贡献的领导干部脱颖而出。政绩成为衡量官德水平的重要参数。

2. 做官要讲政绩

讲政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敬业、勤业、精业、守业。

敬业是指人们在从事本职工作时所具有的专心一意、严肃认真、谨慎尽职的态度、精神和行为方式。《周礼》郑注:“敬,不解于位也。”“解”通“懈”,即懈怠、懒惰之意。宋代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现代哲学家冯友兰也说:“有真至精神是诚,常提起精神是敬。”敬业精神作为人的素质的显现,首先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理性积淀。先秦儒学强调成德立业,要求人生当德行高洁,事业有成。《周易》讲“君子进德修业”(《易·乾·九三》);孔子称赞子产为“惠人”,认为“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孟子强调“君子创业垂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则要求“行义以正,事业有成”(《荀子·赋》),等等。可见敬业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敬业精神包含了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内在地呼唤着主体的投入和创造,体现了一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乐以忘忧、反求诸己的人生气质。同时,敬业精神与当前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个人自身的道德评价和价值追求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利,其原理是等价交换,“利”是“义”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义”,“义”是“利”的手段和途径。这样,“义”与“利”在价值层面上的相通和互为因果,便使伦理道德深入到经济生活中,成为经济生活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原理,从而达到市场原则、道德原则、伦理原则的一致。于是,敬业精神便在经济与伦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经济具有了道德的价值取向,并且赋予道德以一种实践理性的经济功能,为官员实现德才统一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具体要求。

勤业是指在敬业乐业的基础上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方式。勤政为民是中国传统官德之精华,《尚书》中说:“功崇推志,业广唯勤。”(《尚书·周官》)建功立业,关键在勤,勤业不但是民德的要求,更是官德的要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则为民者不可以不勤。业精于勤,荒于嬉。为士者不可以不勤,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则职业蒲弛,岂不上孤朝寄,而下负民望乎。”(真德秀《政经》三十九)官员是否勤政,事关国事的成败、人民的

安危，“官不勤则事废，民受其害。”尤其是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的干部，被称为“人民的勤务员”，更应当勤业，“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点一滴地做好实际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战胜困难。”（《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页）“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转变作风，扎实工作，勤政为民，认真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1991年第13期）勤业，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不仅仅是按上级的安排，老老实实完成任务，更主要的是勤于思考，多想办法，多出点子。只有多思勤思，才会使决策准确无误，才能出新办法，新措施。还要勤于调查研究，广泛接触群众，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杜绝瞎指挥，克服盲目性。勤业不但是本职工作的要求，而且体现了一种道德风范。

精业是对工作力求尽善尽美的精神和实际能力。为官者光有一般工作热情不行，还必须精通业务，具备完成工作任务的实际本领，干部的专业化要求正缘于此。领导干部，尤其是专业性干部不懂专业、不懂技术，就只能是瞎指挥，乱指示，造成“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于国于民都不利。东汉明帝时的王景作为水利专家，治理黄河、淮河，修筑浚仪渠，造福万民，名留青史，“其功之伟，神禹后所再见者”。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官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就迫使每个官员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首先应当具有很高的政治理论修养，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站得高、看得远，能分清是非，善辨别真伪。同时，应当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灵活地、创造性运用科学管理知识，可以使工作事半功倍，还应当具备一至两门专业知识，业务上懂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勤政的效率，才能真正有政绩，才能真正取信于民。

守业是要守住前人和自己创造的业绩，珍惜人民的劳动成果。守业比创业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要当人民唾骂的“败家子”。有的官员由于不懂科学管理，也没有专门知识，为捞政绩，乱来一通，结果导致国家的财政亏损，人民的血汗付诸东流。目前企业的严重亏损，国有资产的流失，企业的大量倒闭停产，固然与市场竞争有关，但不能排除有那么一些企业领导视国家财产为儿戏，对企业不在乎、不心痛，听之任之，根本就没把亏损当回事，以市场竞争来为自己开脱。有的甚至把这个企业搞垮了，又调到另外一个企业，照样当“老总”，既不追究法律责任，也没有经济制裁，人民用血汗换来的这些财富难道就这样白白断送在这些“败家子”手中？天理何在？败家之所以不心痛，在于“家”是姓“社”不姓“私”，并且大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都进了个人口袋，谈何心痛？每倒闭一个企业，总有几个人发财。越是面临倒闭的企业，企业领导越“潇洒”，这是何等的荒唐！我们在提倡艰苦创业的同时，一定要提倡聚业、守业。一些领导干部，干出了一点成绩就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大建楼堂馆所，买高级轿车、盖办公

大楼,滥发奖金福利,以此证明他的政绩,结果会好景不长,负债累累。所谓的“政绩”也就成了“劣迹”。守业是一个官员的应有品德,尤其是在相对贫困落后有待全面发展的当代中国。

敬业、勤业、精业、守业是一个统一过程,是政绩中缺一不可的。敬业展示的是官员的爱国爱民之心和工作上的主动状态;勤业展示的是官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精业展示的是官员的才能;守业展示的是官员珍惜他人、敬重今人,负责来人的情怀。四者构成政绩的基本要素,也是官德的要件。大凡在为官中以政绩见称的人,莫不是讲求实效、勤勉务实、勇于开拓、精明能干之人,他们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的气魄,真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国为民而鞠躬尽瘁地工作。正是这些实干家,托起了人民对官场的希冀;正是这些政绩,才筑起了官德的坚实基础。

200多年前清代民间有个寓言,说的是有个姓李的县官到地府向阎王报到,自称一生为官清廉,所到之处只喝一杯清茶。阎王笑着说:“设官是为了兴利除弊,如果在公堂设一个木偶,连水也不喝,岂不更胜于你?”李县官争辩:“我虽无功,但也无过也”阎王厉声斥道:“你处处只求保全自己,对某狱某案因避嫌疑而不言,对某某事因怕麻烦而不办,岂不负国负民!你虽不是个贪官,却是一个昏官!”像李县官这样的“昏官”在古代又称为“庸臣”,即“安官贪禄,不务公务、与代浮沉、左右观望”。这样的“庸臣”、“昏官”在今天的干部队伍中并不少见。这样的官也许不“贪”但也毫无政绩,即所谓“饭也不吃,事也不办”,整日无所用心,逍遥自在,迷醉于歌舞升平,热衷于迎来送往,“上午围着会议转,中午围着餐桌转,晚上围着裙子转”,“打牌,一宿二宿不睡,喝酒,两瓶三瓶不醉,跳舞,三步四步都会,工作,却是一点不会。”这样的干部是为了混日子,混资历,怕动脑子,怕出点子,怕担担子,工作能糊则糊,敷衍塞责,马虎了事,对群众疾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虽不违法乱纪,但没做一件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既无身心之劳苦,又无失位之忧虑,只要不犯错误,照样一级一级往上升,占着权位而无所作为,误国误民。当代“昏官”何时了!

四、勤政国安民乐

要做到勤政国安民乐,关键是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勤政为民,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1. 深入知民情

坚持勤政为民,必须深入基层,知民情。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部内容,归根到底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党的领导干部职责和责任的全部内涵,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级党政组织,一言一行,无不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要使党委、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了解群众意愿。

首先要强化群众观念。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来自党的长期领导实践活动,是超越时空的历史经验。离开了群众,领导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就会到处泛滥;离开了群众,代表人民利益、当好人民公仆,就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就会难以避免。作为基层领导干部,不论面临多么复杂的局面,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把群众放在心上,相信群众,一切从群众出发,一切为群众着想,把根扎在群众当中,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应对任何复杂的局面,获得不断前进的力量。

其次,要注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党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联系群众作风的具体、直接体现。调查研究就是要走出机关,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带着感情和责任到群众中去,到第一线去了解群众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愿望和要求,真心实意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要和群众交朋友。不断强化平民意识、公仆意识,摆正自身位置,主动和群众、私营大户、外地客商谈心交友,尊重群众、体贴群众,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真实情况,为开展工作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

2. 扎实助民富

坚持勤政为民,必须加快发展,帮民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早在 2000 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的著名观点,他指出,必须“制民之产”,才能够做到“五十衣帛,七十食肉”、“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小康生活”。我国目前还处于不均衡的小康状态,还存在着城乡差异、东西差异,坚持勤政为民,必须带头致富。

首先,“帮民富”不是“先民富”。党员干部带头致富的意思是带头与大家一起致富,而不是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个特殊群体。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人先依靠诚实劳动富裕起来”,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只要是诚实致富,都是好的。如果群众还没有富

裕起来,干部先富裕起来了,即使这个富裕是诚实劳动所得,这个干部作为公民可能是好的,但决非是一个合格的好干部。

第二,“帮民富”就是“带民富”。既然是党员干部,就应该时刻把人民的事业装在心里。领导干部必须有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带领大家“集思广益”、“同舟共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领导干部仅仅是个“好人”是不够的,必须还是一个“能人”,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民才会拥护他。

3. 真诚解民忧

坚持勤政为民,必须多办实事,解民忧。以民为本,多办实事,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作为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只有坚持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才能凝聚人心,加快发展。一要“权为民用”办实事。负一方之责,就要造福一方。二要“利为民谋”抓大事。为民谋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尽快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这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三要“情为民系”解难事。情为民系,就是要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理解群众困难,把老百姓的冷暖、疾苦、安危时刻挂在心上,扎扎实实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真正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等实际问题,密切干群关系。

坚持勤政为民,还必须改善环境,使民乐。安居乐业是人民群众的基本追求。积极营造人民群众舒适方便的生活环境和创业者满意的投资环境,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个地方如果人民群众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更谈不上发展。

总之,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只有知民情,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真心实意、真帮实扶、真抓实干,才能办好人民想办的事,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当好人民满意的“公仆”。

后 记

政治文明之声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务员,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做主,公正、廉洁、修身、勤政,这些都是官德的应有之意。如果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宗旨而背叛了人民的利益,如果他们因褊狭、自私、平庸、懒惰而摒弃了自己神圣的职责,他们就应该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就应受到天地良心的谴责。党和人民赋予他们以权力,这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如果他们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就理应受到惩罚!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不同程序的腐败问题,因此,反腐败已成为各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法律问题。我国目前仍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就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而言,行政权缺少限制和规范是产生行政腐败的主要原因,所以防治腐败应当从规范行政行为和加强道德教育入手,将任何可能滥用的权力限定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并辅之以公开化程序化的措施,这是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监督在执政与行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明确指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公众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是群众监督和民主监督的一种实现形式,是“正义”的监督、“理性”的监督。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党内监督,包括党内民主和政治生活的监督、组织部门的监督、纪检部门的监督,有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有法律监督,有舆论监督等多种方式和途径,而群众监督作为监督方式的一种,是整个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使领导干部在更广泛的范围接受监督和约束。如果,有谁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而党纪国法又不起作用时,人民就是最后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人民可以赋予权力,同样也可以剥夺权力,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讲,就是“黑奴祭起霸王鞭”!在当前现实条件下,它具有其他监督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们提倡“以德治国”，同样也提倡“依法治国”，在法治成为时代潮流的大背景下，我们希望“德治”在“法治”的基础上运行，唯其如此，才能够达到“善治”。江泽民明确地指出民主法治属于政治文明，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因此，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道德建设都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故此，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对新时期干部道德建设既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又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史，亦是我国当代社会全面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鸣 谢

著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学界前辈和同仁志士的友好帮助，不再一一致谢。特别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政治学院原院长应祥烈、华文出版社赵培和主任提出的真知灼见的修改意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慧林、李秋零二位博导和李海彬老师、中央党校的崔振椿、国家税务总局的石志河、中央纪委的汲传峰以及杨正午、王军、傅绍军、冯惠珍、庾景隆等领导 and 友人的帮助和支持。